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郭新茹 陈天宇¹

【摘要】：以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和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基于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 Jacobs 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MAR 外部性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聚 空间溢出 外部性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21)02-0079-09

一、引言

经济社会的“文化转向”趋势已经成为全球浪潮，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功能日益凸显，正在向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迈进。10 多年来，在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双重作用机制下，中国文化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资本、能源、劳动力的瓶颈约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和增长点。集知识链、技术链、产业链、消费链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集群能否通过相关产业的关联互动、分蘖机制、组织惯例的扩散等方式，促进默会知识溢出，进而触发创新，推动新的生产与消费网络的形成，打造以文化产业集群为增长极的都市经济发展方式，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是亟待检验的问题。

文化产业知识密集型的特性决定了其产业空间结构主要采用集群方式，除“创意逃匿”和“经济逃匿”外，文化企业具有典型的集聚发展倾向(Henderson, 1996)。对此，部分学者认为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会发生综合性相互作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朱菊萍等, 2015)。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文化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较为刚性，无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加之中国大部分文化产业集群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管理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产业集聚本应产生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王茁宇, 2012)。基于此，许多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一些研究从微观企业视角指出文化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企业间产生关联互动，推动网络分工深化，实现企业间协同创新，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累积循环发展路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Svirakova, 2013)；另一些研究从宏观区域视角指出文化产业集聚可以改善地区就业结构和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分工体系与合作网络，优化产业结构(Chang, 2009)。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开始重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做了初步探讨，但大部分分析仍不够系统深入，虽已关注到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关于不同类型的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未做出具体分析，且未将地区和行业异质性纳入考虑范畴。基于此，本文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郭新茹，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创意传播基地副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南京 210093)；陈天宇，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创意传播基地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关联视角下长三角文化市场一体化的时空演进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编号:7200409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研究”(编号:20ZDA065)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有别于以往研究多选用人均 GDP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选用全要素增长率指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效率;第二,不同于笼统地探讨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外部性差异,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划分为 MAR 外部性、Jacobs 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三种形式,以深入探究文化产业集聚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第三,为进一步厘清不同条件下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按照区域和行业的不同,对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进行异质性检验。

二、文化产业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1. 文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文化产业集聚可以整合各类市场资源,加速要素流动,并通过分工深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文化产业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除具备一般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以外,文化产业集聚还可能通过以下作用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苏荷”模式表明,在产业梯度转移与转型升级过程中,一个区域废弃的旧工业厂房以其廉价的租金和特殊的“历史记忆”,吸引大量艺术家的入驻,催生该区域艺术产业与其关联产业,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及房地产业的兴起,进而推动某一区域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更新替代。北京“798”、南京“1865”就是典型例证。二是提升文化资源配置效率。多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政策红利”的外生驱动,而文化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导致中国很多地方文化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典型表现是中国很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处于闲置或同质化竞争状态,而文化产业集聚可以借助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整合相关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纠正市场和制度的扭曲,创造出由地方文化资源、政府与文化企业间分工协作而形成的“集体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构建起地方专业化竞争优势。三是营造多样化的创新环境。文化产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关产业的关联互动、组织惯例的扩散,吸引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提供多样性的产业、劳动力、技能与文化,营造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文化生态圈;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需要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工作者分工协作才能完成,这种“杂色团队”的集聚会塑造多样化的文化空间与文化活动、包容性的文化环境,营造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气质,打造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文化地标”“文化品牌”“文化符号”等,如上海新天地、深圳大芬村等。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文化产业集聚会正向促进某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文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与行业差异

文化产业集聚在拉动城市经济增长、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中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处在非均衡状态。文化产业更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的事实表明,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所构建的先发优势,更容易吸引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加速进入,而为了增强获得这些要素的通达性与便利性,在同等条件下,文化企业更倾向于在东部地区集聚,其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整体而言,东部地区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按照国家统计标准,中国文化产业可分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三大类别。文化制造业往往协同产业链上下游纵向集聚。这是因为,通过上下游纵向集聚,集群内部企业可以深化分工,建立起项目导向制的柔性合作模式,推动实现联名生产、信息共享和协调分工,加速分蘖,促进优秀组织惯例的扩散(郭新茹和谭军,2014),最大程度发挥集聚效益,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类文化企业则更倾向于横向集聚,以便快速地获得行业信息与共享消费市场,推动新思想、新技术快速出现。借助于文化产品和服务在集群内的流通和交易,其所包含的文化、知识和技术信息得到了溢出,有利于实现集群企业共享发展成果,快速构建起地区优势产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

假说 3: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

3.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所产生的外部性不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也不同,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 MAR 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专业性空间溢出。随着文化产业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不断加深,文化企业间的依赖性与竞争性不断增强,默会知识的溢出更为频繁。在“一义多用”的乘数效应机制下,文化产业价值链向网络化、立体化延伸,集聚区内文化企业间、文化企业与非文化企业间跨界融合越来越频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集群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二是 Jacobs 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多样性空间溢出。多样性空间溢出的产生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新知识、新信息的快速可得;二是创意相关知识的不断累积;三是学习机会富集和学习渠道的多样性;四是守门人机制的通达性;五是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有效性;六是文化人才获得的便利性。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构建的先发优势,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群在发展演化中快速构建起专业化竞争优势,多样性集聚效应凸显。在此过程中,文化产业集群演变成不同知识的整合中心,创意行为人与人之间通过社会网络形成紧密的非交易性互动关系,文化企业、创意行为人与消费者之间通过消费网络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些不同关系可以激励集群内文化企业在跨行业交流中获得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构建协同创新的产业体系,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 Porter 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竞争性空间溢出。文化产业竞争性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同类企业有序竞争,激发企业创新潜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价格竞争、商业模式差异化竞争等竞争机制降低集群内部以及相关经济部门的交易成本,从而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知识外溢与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来看,目前中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低,集群内企业关联性和竞争性相对不足,文化产业 MAR 外部性作用效果更为明显,但地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主要通过 MAR 外部性实现, Jacobs 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率先在东部地区实现。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首先,为考察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借鉴曹清峰等(2014)的研究成果,构建一般空间计量模型,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具有一定滞后性,故在模型中加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滞后 1 期项,构成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TFP_{it} = \tau TFP_{i,t-1} + \rho \sum_{j=1}^N W_{ij} \cdot TFP_{jt} + \alpha CIA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varepsilon_{it} = \lambda \sum_{j=1}^N W_{ij} \varepsilon_{jt} + v_{it} \quad (2)$$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TFP_{it} 为地区 i 在时间 t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TFP_{i,t-1}$ 为地区 i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滞后 1 期项;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为更好地反映地理距离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以省会城市经纬度为基准,构建省际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TFP_{jt} 为地区 j (除地区 i 外) 在时间 t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CIA_{it} 为地区 i 在时间 t 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 X_{it} 为控制变量; α 和 β 表示影响系数; ρ 和 λ 分别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回归系数,表示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ε_{it} 和 v_{it} 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随机扰动项。

其次,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交互项,考察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基础设施水平与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鉴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与政府干预程度的交互项。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部分变量做对数化处理,具体设定如下:

$$TFP_{it} = \tau \ln TFP_{i,t-1} + \rho \sum_{j=1}^N W_{ij} \cdot TFP_{jt} + \alpha CIA_{it} + \alpha_1 \ln(CIA_{it} \cdot HC_{it}) + \alpha_2 \ln(CIA_{it} \cdot OPEN_{it}) + \alpha_3 \ln(CIA_{it} \cdot GOV_{it}) + \alpha_4 \ln(CIA_{it} \cdot INF_{it}) + \beta X_{it}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HC_{it}、OPEN_{it}、GOV_{it}和INF_{it}分别表示地区*i*在时间*t*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α₁-α₄分别表示其与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前。

最后,从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视角出发,考察文化产业集聚外部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于文化产业集聚外部性差异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进一步将外部性分为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模型设定如下:

$$\ln TFP_{it} = \tau \ln TFP_{i,t-1} + \rho \sum_{j=1}^N W_{ij} \cdot TFP_{jt} + \alpha_1 \ln MAR_{it} + \alpha_2 \ln Jacobs_{it} + \alpha_3 \ln Porter_{it} + \beta X_{it} + \epsilon_{it} \quad (4)$$

2. 变量说明

考虑到2012年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的修订,选取2013-2017年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201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各变量说明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TFP_{it})。目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认知,分别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两种测度方法。由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指标不易量化和权重不易确定等缺陷,故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即 $TFP=Y/(K^\beta L^{1-\beta})$ 。产出Y用地区生产总值代替,并通过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换算为以2012年为基期的实际GDP数值。根据已有研究,资本产出弹性β取0.4进行计算(Young, 1995)。在测算资本投入K时,由于资本服务流的数据无法获取,选取资本存量替代。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计算公式为: $K_t=K_{t-1}(1-\delta)+I_t/P_t$ 。其中,K_t为第*t*期资本存量;δ为折旧率,取9.6%;I_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_t为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12年为基期)。2012年各地区的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折旧-贴现法测度。劳动投入L采用各地区历年从业人员数来测度。

(2) 解释变量:

文化产业集聚(CIA_{it})。采用区位熵来测度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计算公式为: $LQ_{ij}=(q_{ij}/q_i)/(q_j/q)$ 。其中,LQ_{ij}为地区*j*的文化产

业集聚度, q_{ij} 表示地区 j 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 q_j 表示地区 j 所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 q_i 表示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 q 表示全国所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 LQ_{ij} 的值大于 1 表示该地文化产业集聚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小于 1 则相反。MAR 外部性。借鉴 Glaeser et al. (1992) 构建的专业化指数进行衡量, 计算公式为: $MAR_{it} = \max_j (S_{ij}/S_i)$ 。Jacobs 外部性。采用 HHI 指数的倒数进行测度, 计算公式为: $Jacobs_{it} = 1/\sum_j S_{ij}^2$ 。Porter 外部性。借鉴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 的研究, 计算公式为: $Porter_{it} = (N_i/G_i)/(\sum_j N_j/\sum_j G_j)$ 其中, S_{ij} 表示 i 地区 j 产业就业人数在该地区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 S_j 表示 j 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全国所有地区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 N_i 、 G_i 分别表示 i 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数和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3)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HC_{it}) 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计算。对外开放水平 ($OPEN_{it}$) 采用商品进出口总额与 GDP 比值进行测度, 商品进出口总额通过每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政府干预程度 (GOV_{it}) 采用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INF_{it}) 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测度。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经济高质量发展 (TFP_{it})	2.24	0.76	4.55	1.09	150
文化产业集聚 (CIA_{it})	0.88	0.77	3.62	0.17	150
MAR 外部性 (MAR_{it})	1.49	1.68	8.35	0.09	150
Jacobs 外部性 ($Jacobs_{it}$)	83.29	45.85	281.64	10.72	150
Porter 外部性 ($Porter_{it}$)	1.59	0.88	4.34	0.40	150
人力资本 (HC_{it})	0.02	0.01	0.33	0.01	150
对外开放水平 ($OPEN_{it}$)	0.26	0.29	1.38	0.02	150
政府干预程度 (GOV_{it})	0.25	0.10	0.63	0.12	150
基础设施水平 (INF_{it})	18220.88	11909.91	55202.72	2361.09	150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为纠正传统模型在进行估计时忽略空间溢出项而造成的设定偏差, 采用 Moran's I 指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集聚分别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以确定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见表 2。中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 表明某一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会对邻近地区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研究某一区域文化产业集聚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 不能忽视邻近区域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2 Moran' sI 指数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 sI (TFP _{it})	0.060***	0.069***	0.077***	0.085***	0.090***
Moran' sI (CIA _{it})	0.077***	0.075***	0.079***	0.072***	0.060***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中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模式基本一致(详见表 3),表明两者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趋同性。首先,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为代表的华北、华东各省市多位于第一象限(High-High),构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高地。这说明这些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文化市场发育相对成熟,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区域间协同合作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其次,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等地区位于第二象限(Low-High)。这表明由于空间邻近以及发展水平差异,这些地区受第一象限各省市的辐射效应较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化产业集聚获得了较大提升空间。再次,由于辐射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延伸而不断减弱,以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甘肃等为代表的东北和西部各省、自治区多位于第三象限(Low-Low),经济发展质量和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均较低,难以实现有效的空间溢出。最后,广东、重庆、陕西位于第四象限(High-Low)。这表明这些省市自身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但却没有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广东、重庆、陕西虽然整体实力较强,但其内部发展仍十分不均衡,珠三角与粤西北、渝西与渝东、关中与陕北的发展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地区内部发展差距限制了其发展成果向周边地区溢出。

表 3 空间自相关模式

象限	空间相关模式	地区 (TFP _{it})	地区 (CIA _{it})
第一象限	High-High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
第二象限	Low-High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湖北、海南
第三象限	Low-Low	吉林、黑龙江、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第四象限	High-Low	广东、重庆、陕西	广东、重庆

2.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借鉴Elhorst(2003)的研究,选用空间滞后模型作为计量分析模型,经Hausman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见表 4。¹

在模型(1)-(4)中,解释变量文化产业集聚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验证了假说 1 的判断;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正且均至少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经济距离缩短、经济密度提高以及市场

分割程度下降,各区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不断协同合作,区域间联动发展步伐加快;文化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贡献逐步减弱,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可以吸引创意阶层的加入,但随着个体数量不断增加,个体的边际贡献会下降;文化产业集聚与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水平的交互项系数都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较弱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投资驱动,各地基础设施水平已相对完善,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单纯依靠增加投资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要。

3. 异质性检验

(1) 地区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地区间发展差异,为进一步考察文化产业集聚对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三个样本组,仍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文化产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其后依次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人才与资本的瓶颈约束,文化产业集聚整体处在区位选择窗口开放初期。在这一时期,政府会根据某一区域的有利条件来遴选优先发展的文化产业园区,而文化资源型集聚区可以依靠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快速构建起地方专有化的“垄断租”,成为政府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首选载体,再加上其在发展过程可以借鉴东部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园区成熟的管理模式与经验,规模报酬递增趋势明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窗口经过10多年开放发展,大量政策诱致型文化企业持续进入,一些文化园区规模不断扩大,但园区内、园区间文化企业只是在某一空间内集聚,并没有形成马歇尔的专业分工,导致“鸵鸟”型文化企业出现,文化产业集聚在这一阶段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发展态势,运营效率较低,反而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起步较早,很多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已经历过文化企业的竞争,再加上相对高额的租金成本,一些无效的文化企业逐步被淘汰,文化企业集聚的专业化特征与知识溢出效应愈发明显,文化产业园区提档升级加速,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再次显现并将持续。

表4 实证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nL.TFP	1.916*** (9.85)	1.912*** (9.99)	1.863*** (9.95)	1.852*** (8.95)
W.TFP	0.208** (2.03)	0.183** (1.78)	0.208* (1.86)	0.200* (1.73)
CIA	0.321*** (2.82)	0.324*** (2.91)	0.334*** (3.18)	0.339*** (3.00)
ln(CIA • HC)	-0.085 (-1.19)	-0.382* (-1.89)	-0.448** (-2.37)	-0.423** (-2.08)
ln(CIA • GOV)		0.302* (1.66)	0.284* (1.82)	0.283* (1.85)
ln(CIA • OPEN)			0.077*** (3.01)	0.075*** (2.85)
ln(CIA • INF)				-0.220 (-0.31)
OPEN	-0.361*** (-4.16)	-0.339*** (-3.67)	-0.468*** (-4.06)	-0.471*** (-3.95)
HC	0.050** (2.02)	0.080** (2.36)	0.082*** (2.63)	0.079** (2.30)

GOV	-0.112(-0.49)	-1.166*(-1.72)	-0.971*(-1.72)	-1.00*(-1.80)
INF	0.001(0.50)	0.001(0.50)	0.001(0.52)	0.001(0.56)
Cons	0.209(0.68)	1.313**(2.04)	1.474**(2.50)	1.645**(2.11)
ρ	-0.127*(-1.69)	-0.114*(-1.41)	-0.101(-1.14)	-0.089*(-0.89)
R ²	0.976	0.978	0.980	0.980
N	150	150	150	150

文化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在中部地区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文化产业集群规模扩张遭遇市场瓶颈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以使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边际贡献。政府干预程度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政府服务意识较强,在建立与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吸引了众多成长型文化企业进入,进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集聚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政府干预程度增强导致文化产业集聚的边际贡献减少,负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行业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差异,按照国家统计标准将文化产业分为文化制造业、文化零售与批发业和文化服务业,对样本进行分行业检验,结果见表 5。整体来看,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一定提升作用,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在模型中的系数分别达到 1.364、0.148、0.182,从而验证了假说 3。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行业分类来看,相比于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文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细分门类最多,劳动密集型特性最强。政府作为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推动力量,在选择何种特色文化产业集聚时,重要的考量指标之一是对当地就业的带动能力,各具特色的丝绸小镇、紫砂园区就是例证。可以说,文化产业集聚大多发端于文化制造业,由于起步早、体量大,在累积效应的作用机制下,会带来优于文化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推动作用。二是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B2C 商业模式以其低价格、多选择的特点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对文化批发和零售业的挤出效应也越来越强,相比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集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较低。三是文化服务业虽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比重较大,且具有较强的就业带动效应,但由于文化服务业集聚主要是同类企业的横向集聚,一方面这会促进企业间通过默会知识的溢出实现市场信息的快速传播,推动产生新概念、新产品和新项目以快速对市场做出响应,另一方面众多类似项目催生了大量同质化文化服务业园区,园区、企业间对人才、资本等要素的恶性争夺会抵消部分文化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正向效应。此外,在高新技术推动下,文化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产业业态丰富、产品迭代迅速的特点,然而由于相关技术、法律法规的缺失或滞后,很多文化服务业如网络直播业、网络文学业所创造的价值并不能完全被纳入统计,文化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未能完全体现。

表 5 文化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检验

	地区异质性检验			行业异质性检验		
	东部地区 (1)	中部地区 (2)	西部地区 (3)	文化制造业 (4)	文化批发和零售业 (5)	文化服务业 (6)

lnL·TFP	2.095*** (9.56)	1.039*** (63.99)	0.917*** (51.12)	1.592*** (5.64)	1.932*** (9.99)	1.800*** (10.33)
W·TFP	1.022** (5.04)	0.019 (0.86)	-0.132** (-1.91)	0.368* (1.91)	0.227* (1.86)	-0.846*** (-2.95)
CIA	0.173** (2.18)	-0.089** (-1.99)	0.461*** (3.93)	1.364*** (4.20)	0.148** (2.10)	0.182*** (2.92)
ln(CIA·HC)	0.006 (0.01)	0.548** (2.10)	-0.147* (1.75)	-0.123*** (-3.96)	0.083** (2.56)	-0.074** (-2.15)
ln(CIA·GOV)	-0.893*** (-2.67)	-0.226 (-0.96)	-0.252** (-2.49)	-1.202*** (-3.56)	-0.242 (-1.01)	-0.366* (-1.87)
ln(CIA·OPEN)	0.309*** (4.48)	-0.155*** (-5.84)	-0.008 (-0.78)	-0.104 (-1.49)	0.139 (0.72)	0.218 (1.29)
ln(CIA·INF)	0.253** (2.35)	-0.085*** (-3.32)	-0.013 (-0.87)	0.001 (0.72)	0.038 (0.52)	0.001*** (4.30)
OPEN	-0.207 (-1.27)	1.235*** (4.47)	-0.090 (-0.90)	0.028 (0.79)	-0.458** (-2.41)	0.010 (0.05)
HC	0.052 (0.81)	-0.049 (-1.47)	0.011 (0.80)	1.027*** (3.91)	0.070* (1.85)	0.057* (1.86)
GOV	6.745*** (3.65)	1.066 (1.02)	0.534*** (2.60)	0.082 (1.24)	-0.416 (-0.71)	-1.081* (-1.77)
INF	-0.001 (-0.56)	0.001** (2.07)	0.001 (1.48)	0.022 (0.55)	0.001 (-0.20)	-0.001** (-2.15)
Cons	-5.201*** (-2.83)	-1.016 (-0.98)	-0.934** (-2.57)	-1.670** (-2.25)	0.590 (0.79)	1.138* (1.82)
ρ	-0.619*** (-3.00)	0.024* (0.62)	0.164* (1.67)	-0.148** (-2.18)	-0.109 (-1.23)	0.491*** (5.42)
R ²	0.981	0.997	0.998	0.922	0.974	0.977
N	55	45	50	150	150	150

4. 外部性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为进一步考察其空间溢出的作用机理,采用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种指标,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进行探究。

如表6所示,第一,MAR外部性所产生的专业性空间溢出是文化产业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从而验证了假说4。MAR外部性的作用效果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随后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第二,Jacobs外部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即多样化的文化产业环境尚不能有效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Jacobs外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即文化产业集群要具备产业类型丰富、包容性较强的软硬环境以及与众不同的园区特质,以源源不断地吸引创意阶层。然而,中国大部分文化产业园区是由政府催生的,园区内文化企业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关联互动,无法构建竞争协同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不能有效吸引创意阶层的进入,或不能有效促进不同文化细分领域的创意性人才之间的默会知识溢出,导致Jacobs外部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最终难以发挥或成效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中西部文化产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系数为负,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提高,Jacobs外部性所产生的多样性空间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逐渐显现。第三,Porter外部性所产生的竞争性空间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负向相关,表明当前文化产业集群间的竞争更多是同质化所带来的恶性竞争而不是协同竞争,以至于竞争性空间溢出无益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大部分文化产业集聚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现阶段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不能为一些高技术和高创意的文化产业项目保驾护航,导致一些高成长性的文化产业园区不能构建起可持续的专业化竞争优势。

表 6 文化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性检验

	分地区			整体 (4)
	东部地区 (1)	中部地区 (2)	西部地区 (3)	
lnL·TFP	1.920*** (6.92)	0.968*** (38.92)	0.490*** (19.54)	0.931*** (59.19)
W·TFP	1.456** (2.02)	-0.085 (-0.65)	0.037 (0.52)	0.088 (1.33)
lnMAR	0.071** (2.03)	0.074*** (2.71)	0.009** (2.57)	0.007** (2.04)
lnJocabs	0.461 (1.47)	-0.095 (-1.01)	-0.204 (-1.17)	0.006 (0.67)
lnPorter	-0.177*** (-2.72)	-0.001 (-0.12)	-0.002 (-0.30)	-0.003 (-0.49)
OPEN	-0.003*** (-0.01)	-0.196* (-1.75)	0.181* (1.86)	-0.014 (-0.81)
HC	0.044* (1.51)	0.036** (2.54)	0.011 (0.99)	0.008** (2.44)
GOV	1.030* (1.87)	0.111 (0.47)	0.252** (1.96)	-0.070** (-2.01)
INF	0.001** (2.06)	0.001 (-1.24)	0.001** (2.12)	0.001 (0.46)
Cons	-0.266 (-0.45)	-0.422 (-2.72)	-0.551*** (-3.96)	-0.060 (-0.98)
ρ	-0.244** (-2.05)	0.229* (1.57)	-0.005 (-0.03)	-0.118* (-0.86)
R ²	0.982	0.991	0.980	0.996
N	55	45	50	150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文化产业集聚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了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并选取 2013-2017 年全国 30 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在采用 Moran'sI 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文化产业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逐年增

强,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自相关性却现波动下降趋势;②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③分行业检验表明,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不同的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④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基于外部性的空间溢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 Jacobs 外部性和 Porter 外部性, MAR 外部性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一,推动文化产业差异化集聚。

各地区应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和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举措,形成文化产业集聚的错位竞争、协同发展、联动发展。东部地区要以文化产业功能区建设为抓手,强调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集聚与经济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应强调依据产业梯度分工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通过链接全国乃至全球价值链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引导园区内、园区间企业建立起基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交易网络,促进文化产业园区提档升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要更强调与城市发展充分融合,形成园区、社区、城区三区合一的新格局,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名城名镇名村众多的优势,留住文脉乡愁,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下建设一批有历史记忆和地域特点的文化街区、创意城镇,形成沿路、沿江文化产业高地和特色文化产业带。

第二,优化区域间文化产业分工格局。

依照各地区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文化产品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制度建设,构建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行业奖励惩罚机制,不断优化文化市场环境,促进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鼓励东部地区将知识含量、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形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最大程度发挥文化产业集聚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文化产业形成东部地区居首、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居尾的“雁阵”分工格局。

第三,优化文化产业集聚的外部环境。

重视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等因素在文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引导园区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加大引智力度,构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人才支撑;提升城市的包容度与适宜性,吸引跨国文化企业在文化产业园区内设立分支机构、创意设计中心、销售中心和工作室等,鼓励园区内龙头文化企业以并购、战略联盟、项目合作等方式“走出去”,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好、营造好创意创新的文化生态氛围,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Chang, S. Great Expectations: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Case Study of A Government-Sponsored Creative Cluster.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9, 3: 263-273.

[2]. Elhorst, J.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3, 3: 244-268.

[3]. Glaeser, E., H. Kallal, and J. A. Scheinkman, et al.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6: 1126-1152.

[4]. Henderson, J. Ways to Think About Urban Concentration: Neoclassical Urban Systems Versu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6, 19: 421-425.

[5]. Svirakova, 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pany in Creative Cluster.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Leadership & Governance*, 2013.

[6].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y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3: 641-680.

[7]. 曹清峰、王家庭、杨庭:《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8]. 郭新茹、谭军:《相关性产业关联互动、企业分蘖机制与文化产业空间集群演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9]. 贺灿飞、潘峰华:《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地理研究》2009年第3期。

[10]. 王茁宇:《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效应及面临的问题》,《经济纵横》2012年第8期。

[11].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2期。

[12]. 朱菊萍、潘时常、董磊:《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3期。

注释:

1 一般而言,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限于篇幅,并未详细列出选用空间滞后模型的过程,备索。